

# 《老庄道家与环境哲学的会通研究》后记

谢扬举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因为主张和论证“道法自然”,老子被西方学术界奉为世界环境哲学的先祖。阐扬老子思想的庄子则被列入世界历史上50个环境哲学家之一。道家对环境哲学建构和完善的突出价值,已经得到许多西方专业哲学家的高度肯定。这类共识可谓越聚越多,为道家的生态转型和通向环境哲学殿堂铺垫起一条通衢。但是在西方人的发现抑或赞誉面前,中国学人不可沾沾自喜,浅尝辄止。我们应该保持文化和自然自觉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清醒、更严峻的反思。

中国虽然有亲自然的道家文化,然而它与我们时代需求的环境哲学还有很大的距离,甚至与现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的建设性成就相比也有明显不足。我们需要平心静气地聆听少数“刺耳的”声音。曾有西方学者认为,道家理论中到底有多少可用的环境思想难以认定,如果道家固有环境保护的功能和价值,为什么现代中国同样陷于环境困境和危机?巴斯摩尔认为,西方不需要也不能从中国引进环境思想资源,那样最终会危及西方自己的文化生态。罗尔斯顿也表示过,即便中国有丰富深厚的环境思想,但是环境与地方息息相关,西方不同于中国,不应该照搬中国思想,西方必须有自己的环境哲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更严格冷静地审视东西传统文化的异同,醒悟各国、各地区所遭遇到的环境困境的不同,看到道家和环境哲学之间贯通、阐释和建构的艰难,最终构建出使用中国话语、具有世界意义、被学界公认的环境哲学。环境哲学是一个正在繁衍的大家族,未来中国式的环境哲学虽然讲的是哲学的“普通话”,但是话中的实谓和意义将决定它有自己的特色。笔者下面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

对中国道家如何走向形成中的环境哲学,略谈若干点浅见。

—

环境哲学目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庞大领域,然而仅此而已,或者正因为研究过热,反而离具有严格规定性的哲学学科还有不小的距离。换句话说,环境哲学必须早日为自己找到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和学科逻辑,并且其核心观念最好能找到历史性的萌芽或起源。

由于中西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中西方涉及环境的思维、观念、理论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各自如何走向自家环境哲学的途径理应有所不同。中国环境哲学的建构不能不兼顾中国文化的背景和特质,而沿着道家的道路往下走,汇入世界学术潮流,可能是一条适宜和明智的选择。

环境哲学是如何在西方出现的?20世纪中叶爆发出频发的、大规模的现代环境危机。它迫使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作为先行工业化、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环境和生态问题更为突出,因此他们比东方国家更早地关注起相关问题。现代环境思潮有个共识,就是寻求环保的哲学基础。环境哲学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应运而生。不可忽视的是,西方环境哲学的产生,是在环境危机爆发之后,因而是以反思为主的智慧,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应急反应的结果。悖谬的是:西方环境危机的产生,与其挑战自然的哲学和宗教传统文化有内生关系。从反对自然的传统文化中开辟出拯救自然的哲学,想想就比较吊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西方,一方面是环境哲

学过热;另一方面,在深浸西方哲学传统的“经院”派哲学家那里,还是常常遇到不理不睬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学者将环境哲学定义为人和环境的关系的哲学。这个定义有针对性,或者说有时代性,但是存在超历史的缺憾。该定义的特点在于:人和自然以分离的、对抗性的二元存在被接受下来。

究竟何谓环境哲学?笔者很难做出完美回答。尽管环境哲学是经过西方移植到中国的,但是中国学者很快就发现其理路与中国哲学似曾相识。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作为古代思想学派,道家蕴含有丰富的环境思维、生态和自然理念。为什么中国在没有遭遇大规模环境危机的古代会超前产生这种哲学?这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有关。

中国古代文明属于农业文明,这种文明形态需要良好的自然条件,例如讲究顺应天时、相土而耕、节用资源、艰苦朴素等。农耕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相应的生存经验,促使中华民族对自然形成了独有的信仰、价值观、理念和思维方式。先民们在自然大系统的怀抱中生产、生活和繁衍,与自然产生了多方面的态度和情感,从迷信自然、崇拜自然、敬畏自然,到观察自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利用自然。这些方式,是先民们在与自然长期打交道的实践中形成的人和自然一体化的纽带和活动准则。可以说,古代人与自然交换获得生存资源的前提是不打破自然、不违背自然。这样的背景使中国古代农业政治、农耕文化、天人关系的学术探讨尤其发达,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不少中国人将这种理论模式称为“天人合一”。虽然并不恰当,但是其积极意义还是大于消极意义的。至少在西周到战国,中国已经形成比较具体的天地人和时令统一的农业政治文化纲领。它们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部分,是合乎生态的智慧,也是道家的活水源头。春秋末期老子创立的道家,是中国文化土壤中自然产生的伟大果实。

由于这种环境思想是来源于人类原初条件下生存方式的产物,所以它一开始就认定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可以说,人和自然分开说事,对于中国这样的文明和思想传统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古人由此而走上了天人关系、天道和人道关系的追问、协调之路。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环境思维,根源于自

然而然的有机世界观和天人相随的生存实践。与西方对照,中国的环境思维传统更为古老,更为积极有效。中国的环境思维在道家学派那里有最完整的体现。“道”是道家最高的学术范畴,它和道家其它范畴、概念在一起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包罗性极强,其基本特点是综合天道、人道,或者说融道、天、地、人、生、物于一炉。道家这种思考转换成现代术语,实际上就是有关人类社会和大小环境因素的系统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与现代环境研究存在着可以沟通的地方,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我们必须从思维方式上寻找道家的特质,清理其对当代环境哲学构建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环境保护如果能在民族传统文化内部找到知音和同道,将会顺理成章,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结合不成功,徒袭西方,没有中国特色不说,到头来可能停留在浅层环境保护的层面,使生态文明成为泡影。可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重视道家传统中蕴藏的生态保护文化资源。

## 二

道家与目前的西方环境哲学视野互有异同,二者各有强弱,但总体上看,道家可能代表真正的、比迄今为止的环境哲学更加本质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向。不过,二者在今天语境中的“科学性”上也存在着差异。

现代环境哲学于20世纪70年代诞生于西方,它直接面对的首先是自然客体及其世界。它讲的环境是物质与生物环境,恰当的说法是生态世界及其危机。道家则是一种绵长的人文传统,在道家理论中本来不存在生态和环境这样的确定对象。不过,道家哲学里虽然不曾有西方环境哲学那些基本术语,但是在环境哲学出生很久之前,道家已经将一切纳入到环境和生态的整体统一中思考了。当然,有了这个优势不表示一长百长。应该说,思维可以是一个形式、一个不带内容的空壳体,而内容必须是具体的。好形式、大形式必须充实以好内容、大内容,理性、经验要有不断的综合。从这一点看,道家内容不充分,科学含量不足。所以,从道家到生态智慧的阐释,必须充实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环境史等实证内容,这一点恰恰是许多从事道家环境哲学诠释

的学者所缺乏的。不经过科学的媒介,脱离现代环境难题,道家只能停留在不可实施的抽象形态。这是目前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需要补上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知识与方法一课。

现代环境哲学着重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有一个自我设定的视域:即我们所讲的环境危机,主要起因于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有的环境哲学家认为,环境哲学只需要考虑人类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因素。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在富有建设理性的同时,无可否认地也具有损害性,遗憾的是后者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自从有人类生存,就免不了出现环境问题,但是伴随工业文明的演进,人类将环境视作无关痛痒、取之不尽的财富源头,给环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按照现有的社会机制和人类价值观,这种破坏很难扼制。与传统自然哲学不一样,现代环境哲学考虑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及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现代环境哲学所讲的“环境”,不应该仅仅理解成单纯的对象化环境或外部物质环境。简言之,人类与环境作用的过程,难免产生种种哲学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仅靠自然哲学和科学技术是解决不了的,因而需要对人和自然展开双向考虑。道家正是这样思考的。道家不接受无价值、无意义的纯粹自然界和自然事物的观点。在道家那里,确有对道、天、地、生、人、物一体关联的总考虑,包含对天和人、天道和人道之间、地位关系的梳理,也有技术行为要服膺于道的这种很好的价值理性。道家的这些考虑可能比现代环境哲学讨论环境的方式更为根本。但是同样不能疏忽的是:道家需要补充形而下的具体内容,而如何“下行”不是靠思辨就能解决的。研究环境、研究生态属于道家份内事务,只有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本来面貌,才能增进和完善道家对自然事物价值的确认;也只有带着道家式的态度和视角才能研究好自然事物。道家向生态哲学的下行,阐释好了会导致科学的创新;阐释不好,可能就会使得道家与现代环境问题的解决擦肩而过,两不相干。

主流的传统哲学总体上跳不出人道化、人文主义化的落脚点。问题是:仅仅以人(类)为目的,最终反而可能害了人(类)。环境哲学不是以封闭的人类社会及其孤立价值为对象,环境哲学是懂得更好地“人为”而“为人”的学科。明确而言,它不是传

统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延伸,而是采用环境哲学思维的新人文主义、新人道主义哲学。在许多情况下,它有对人类过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波及面会很广泛,例如对传统知识、道德和价值标准提出挑战,乃至需要社会文明形态发生历史性变革。环境哲学在批判和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对环境变化和人类环境行为展开事实评价,进而提出价值判断。过去单纯以人类及其现实性需求为评价标准的道德观,放到人与自然的关联系统和未来的天平上,很多是难以成立的。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立场如何,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自己行为的重新评判。例如,自然环境、动物、物质有没有适当的道德地位?环境伦理如果成立,传统伦理学需要做何调整?如何发展和壮大自然美学欣赏能力?如何科学系统地确立环境价值?人类如何重新定位自己?人类需要什么样的自律?这些新问题都需要超越人类社会视野加以审视。在这个方面,中国道家确实能够提供诸多启发,例如以“无为”为人类自律原则、肯定天地自有神奇和大美等,但是也需要适应时代,完成现代化转型。

### 三

道家不局限于现时代一般所谓的环境哲学,它对人类心灵问题有纵深的探讨。环境问题中有许多其实不只是外在问题,而是需要人的心灵得以重生。道家关于内在精神的理论具有深刻性和实践性。受其影响的道教也非常注意心神发展,比如内丹术注重精神修炼。过去我们只单纯地注意到这一点,没有看到其广泛和潜在的价值。其实内在化、外在超越二者是两极相通的,它们建立在道家道教对人与环境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道家道教对内在修养的发展,以别样的方式反映了其环境观和环境行为。早期道家即注重精神培育,他们对心态进行了各方面的建构,提供了多种内修的技艺。老子、庄子的道论不只是文字符号、章句话语和空洞理论,而是与内修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老子、庄子所提出来的具有内在深度和超越心态的人格理想,比如“真人”、“至人”、“神人”等,可能是生态人格发展的重要方向。

苗建时讨论上清派时指出:“从‘宗教与生态’

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传统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拥有这种思想:真人或精神超越的仙人被认为完全超越现实,投入到自然的怀抱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人由于身体的变化与精神的超越为了偶像,宇宙的完美与圆满便由此得以呈现。”施舟人在研究《一百八十戒》时指出:“《一百八十戒》从未涉及到更高权威的反抗,未涉及政治斗争和报复,未涉及公平与和平的需求,只谈及调息,谈内在的和谐与个体的安宁。这是解救环境的唯一方法。真理只能在自身中找到,为了调节世界,我们必须修炼自身,照顾我们的内部景观。通过多方位地审视道教祭酒的戒律,我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精神生态学。”苗建时和施舟人对道教的评价可谓独具慧眼。这方面的特点正是现代环境哲学所缺少的。而且按照现代环境哲学的运思,很难产生道家道教那种精神生态的思想。西方现在有一种心灵生态学、精神生态学的提法,这两个提法很有发展空间,相信道家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可以结合的内容。

综上所述,环境哲学所言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阐释,“环境哲学”、“生态哲学”仍然有待学理上的澄清。当我们说摆脱环境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其中的“环境”、“生态”有更加复杂的含义。它们实际上指的是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某种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动态关系。这样的“环境”概念比我们通常遇到的自然客体更复杂、更难以分析和把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事实上已经是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交融而成的环境复合体还原为纯粹的物质环境、生态环境,也不能仅从人类社会或外在的东西出发来考量问题。鉴于此,环境哲学的建构还有很长的理论完善之路,中国道家要成为普遍认可的环境哲学也是这样。

接下来我想表白一下自己对环境哲学研究的希望。对于一个从事思辨活动的人而言,今天我们能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我想,环境哲学就是其一。如果苏格拉底活在当代,以他对人类的忧思和关怀,他势必会成为一位环境哲学家。记得在清华

大学哲学系主任卢风教授发起和召集的一个生态哲学论坛上,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教授认真地说:中国哲学家没有哪个不是环境哲学家!他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哲学整体上体现了一种环境思维,治中国古代哲学或多或少都已经在从事环境哲学研究。我很欣赏他的见解,尽管他尚没有论证而只是直觉的神会。不仅是道家,儒学、佛教、道教以及其它思潮都蕴藏有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环保思想。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如何将这些理念与近现代环境哲学走向相互融合,创新出适合中国现时代的环境保护哲学和伦理,并将之贯穿到环境教育中去,使其深入人心,培养真正具有环境保护意识的生态公民,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老庄道家与环境哲学的会通研究》是在笔者十年来思考和试笔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一份阶段性结果。想到其即将面世,我的心情很复杂,可以说又喜又怕。喜的是,能向学术圈子提交一份作业;怕的是,书稿存在诸多遗憾,有许多问题和思路尚未展开,而已经刻画的问题没有得到较为如意的解决,已经展开的思路和环节也没有达到严格的论证。套用学界久已存在的流行语,推出她权当抛砖引玉吧。

最后,本书的产生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的资助,特一并鸣谢于此!此书成稿有两点需要交待:一是书稿各章少数地方有交叉,这是一个瑕疵;二是部分成果采自笔者近年来已发表的成果,笔者感谢相关期刊同意引用。我从中国思想史领域延伸到比较哲学和环境哲学研究,我的老师张岂之教授始终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并相信这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很有好处,让我非常感动。书稿形成的期间,我先后二十余次参加各种环境哲学、道家道教等学术讨论会,专业小圈子内的人士总能给我各种意外的启发,我倍感珍惜。书稿撰写过程中,我从和我的博士生张军、路传颂、陈鑫、崔丽萍、苗彦恺、张丽萍、代超等在平时的学术讨论中也受到一定的启发,聊致谢意!科学出版社王贻社编审、杨静编辑认真负责,成人之美,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令我难忘!